

用具的时候,以表格形式列出名称、规格和材质、用途等等,看起来简单明了,并适时地配以插图作为补充。说到插图,也是本书较之前两者有非常之进步的一个方面。正文前的彩色插图图片清晰生动,大多为书籍装帧形式,如卷轴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此外还有书盒、书夹,最后一幅是作者修复的《宿州志》图片。除此以外,正文部分也配有大量插图,如装裱修复工具、锉书以及冲淋法、喷水法清洗书页等等。尤其值得肯定的配图是线装书的穿线部分,将穿线方式和穿线方向各个步骤标明次序呈现给读者。

在内容的呈现方面,本书相对于前两书的最大突破在于最后两章,即“探索篇”和“文献篇”。

“探索篇”分为三节,第二节中列出了几种应用现代科技成果进行修补的方法,如干燥技术中的远红外线干燥法、微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修补机械中在安徽问世的档案修裱机、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纸浆修补机、奥地利的文献修复机、自动洗纸机等,用化学制剂对纸张实行的对口粘接技术,以药物清洗书叶等等。利用这些现代的修复工具和技术方法,不仅能达到传统技艺所不能企及的效率,而且还有无色透明、不霉不蛀、对字迹无影响等优点。但是,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也不是对所有破损书籍都能用,要因书而异,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要的时候,不能抛弃传统的修复方法,毕竟那些传统的方法和技术是经过前辈们数千数百年经验积累下来的,具有手工修复自身的优势。除此,“探索篇”还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分别叙述了富于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传统技艺以及以清代皇家书籍为典型的“整旧如旧”。尤其是“整旧如旧”一节,从多方面探讨了皇家书籍的特色,如象征王权的装潢色彩、象征帝后的龙凤

纹饰、装潢材质的等级差别、华贵富丽的装潢材料、丰富多彩的装帧形式、典雅大方的装潢设计、应有尽有的护书用品、精致考究的制作工艺、风格多样的鉴藏宝玺、雍容舒缓的装潢节奏等等,给我们审视古籍提供了一个新的而又全面的视角。

“文献篇”里面分为三节:古代文献提要,现代专著提要,中国古籍形制、装帧与修复论著索引。此篇章对古代及现代与古籍装帧与修复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总结,有专著,有论文,也有与此相关的章节或短论。作者提到:

在古文献中,若想找寻关于古籍形制、装帧和修复方面的资料,是一件颇费周折而鲜有收获的事情……这与古籍的形制尚未确定,从事古籍修复技艺的工匠艺人地位低微、自身缺少文化、而文人又不屑于写此类文字等多种因素有关。

民国以来,随着书籍制度发生革命性变化,旧时的古籍已成为具有学术、艺术和历史文物等多重价值的珍贵遗产,因而探讨古籍形制、装帧等专题的论著逐渐增加,且日渐深入……古文献记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民国以来发表的若干文章就成了研究工作的文献基础。

因此,可以看到,古代文献提要下专著部分只有明周嘉胄的《装潢志》和清周二学的《赏延素心录》,有关章节或短论部分有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之卷十等24种。现代专著提要有《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图书维护学 图书装订·保存·修补的理论与实务》等十种。“中国古籍形制、装帧与修复论著索引(1926~1995)”部分,更是列出了多达二十几页与此相关的论著索引,兼有中文、英文和日文文献。

此书可谓三本书之精华也。若要继续深入从事古籍修复与装帧的研究,可将其作为必经之道口,兼有路标指示之功用。

·书语者·

“落花生精神”与“蜘蛛哲学”

李海燕

第一次看到许地山的名字,是在小学的语文教科书上。《落花生》,一篇看来并不怎么起眼的小品散文,拙朴单纯,从一粒花生却也可映照出人生。文章的主旨是散文中的“我”领悟并揭示出来的,“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

许地山再次进入视野,使我开始对女性主义文学发生兴趣。身为受“五四”精神直接影响的一代,许地山不仅作为燕京

大学的学生代表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还拿起笔杆子,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这之后二十年的时间里,许地山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等。其中《缀网劳蛛》、《春桃》、《玉官》等都可算作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声。许地山思考女性命运,探讨女性独立意识,着力塑造了文学史上一个个动人的女性形象,力求触及人们的心灵。

许地山是同时代文学家中较为特殊的一位。他的处女小说作品《命命鸟》，主题是表达封建礼教的可恨，字里行间浓郁的宗教色彩和东南亚风情却令彼时的读者耳目一新。这还只是作为文学家的许地山，他同时还是一位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生命中最后的六年，是在香港大学度过的，这六年里，许地山建树颇多，使香港的文化教育面貌焕然一新。在亲人的心目中，许地山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一连串的现象及其背后的缘由说清楚了，才是从多棱镜里看到的许地山，丰满而有棱有角，全面且不乏细节。南京晓庄学院王盛教授新作《缀网人生——许地山传》（香港书作坊2006年12月版）便是这样一部丰赡饱满的传记佳作。

作为一部现代史上的人物传记，著者延续了评传的写作体系，采用专题叙事的方法，像串珍珠一般，将许地山的一生清晰明了地展现给读者。著者通过“魂牵故土、父子情深、风云岁月、生生不乐、驰名文坛、学者之路、爱的苦旅、新的高度”、“东野先生”、“文化战士”等十个专题，将先生的一生展现给了人们。从专题的组织可以看出，著者排篇布局的高超。每个专题都是在描摹许地山的侧面像，一经组合，人物形象顿时变得立体丰满。

许地山既是“五四”的闯将，也受环境的熏陶成了佛教、基督教忠实的信徒；他不仅在文学上不断迈上新的高峰，在学术的道路上也是奋发苦读，勤奋探求；埋首于案头文章的同时，他也热切关注国家命运，传播新文化。这些多面的许地山，构成了他作为一个有诚挚品格和独立精神的作家、学者的特质。他的为人正直无私，如同他笔下的“东野先生”；而在爱情的苦旅中，曾遭丧妻之痛，幸好后来“幸福与苦恼交织的爱”包围了他。他的“爱情公约”写得恳切又有几分可爱的劲头。郁达夫20年代在上海遇到许地山，许地山却是讲不上几句话，就和孩子们抛皮球、踢毽子了。在香港，许地山更是经常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苦孩子。这些不为公众所知的另一面，一经揭示，人们可以理解文章之外的许地山。原来，在生活中，他是一位童心不泯、乐于助人的凡人。

我注意到，书中有一个细节，关于许地山的长女樊新。樊新是许地山与前妻林月森所生，与继母周侯松在相处中有些龃龉。许地山并不袒护哪一方，只是努力完善为人夫、为人父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许地山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长女樊新，更在思想上鼓舞她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在樊新沿珠江到达广西梧州之后，许地山给她来信，在信中，既是慈母又是严父一般的话语：“在外常常想自己的言行，做事要有恒，要以善意估量人，这是立身的金针。”“神甫好意对你，你却没想到他会猜想你父母为什么不给钱你用，以致你向他来借。人家纵然会赞你有独立精神，也会说你家的人太不爱惜你，其实呢？”这些都是许地山不为公众所知的另一面，而这些，恰恰更

能反应一个人的品格和气度。

人都是多面的，这在写传记的时候却容易被忽略，特别是传主为“大家”时。著者并未受此局限，正如，香港余思牧先生在序中所述：

“在本书中，传主不仅是一位诚挚的、有独立风格的文艺创作家，勤奋、严谨而目光远大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位言行一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健全公民。”

人们需要看到的就应该是这样的许地山，不仅仅是高山仰止的许地山，也是触手可及的许地山。而作为一部研究性的人物传记论著，这部书最重要的贡献是肯定了许地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著者不只记其经历，且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与交际网络中探讨了其内在气质与精神。

许地山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并与茅盾、郑振铎等十二人一起发起组织了“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后期，曾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为改革香港的旧教育、旧文化作出过很大贡献，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但在现代文学史上，他却常常被淹没、被忽视。为了国家的文化事业，许地山不惮辛劳，兢兢业业；他低调做人，从未谋取自身的私利。是怎样的人生信念在支撑着他不懈向前呢？

这可以从许地山的作品中找到答案。著者在行文中评述、解读了许地山众多的文学作品，而作家的创作往往与自身阅历密切相关，且借作品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许地山笔下的“落花生精神”与“蜘蛛哲学”正是他个人的精神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

许地山不仅写作《落花生》一文以明志，还以“落华生”为笔名，将落华生的精神付诸实践，一生为社会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尽心尽心地像落花生那样去生活、去做人。而“蜘蛛哲学”呢？许地山二十四岁入闽南伦敦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但在此之前，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他的母亲笃信佛教。他在1913年赴缅甸仰光中华学校任教时，俄国风气使其进一步谙熟佛教三昧。“蜘蛛哲学”中便包容了宗教的因素，许地山认为，人的一生是在补缀着一张网。网到什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直补缀的过程。

它（“蜘蛛哲学”）包含着许地山对于人生的深切感悟。因而带有强烈的宗教情绪是显而易见的，既反映了佛教认为人生多苦的观念，重视现实、强调主体自觉的精神，也渗透着基督教提倡忍耐、顺从甚至道教的逍遥、乐生等思想。

“落花生精神”与“蜘蛛哲学”相结合，便是以出世的态度来入世。一方面保持锐意的进取之心，一方面又保持平和的生存态度；一方面积极地去做一个有用的人，一方面也明白人的命运是被限定了的。许地山一生都在求索着人生的密码与终极目的，也在行动中表明了自己的赤子之心。

本书文字读来颇为流畅,此番更是作者第三部有关许地山的论著,积累了深厚的写作经验。潮水来时,总是一浪高过一浪,著者笔下的大事件、真感情也是一幕幕渐入佳境,让人读得欲罢不能。且因资料运用的娴熟,因此无需长篇大论,能一句说完便一句说完,在谋篇造句中也极少使用长句。这样的阅读体验相当顺畅。

“许地山的作品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

与古旧情绪相融合,使散文发展成一个和谐的境界。”这是沈从文对许地山所下的结语。“和谐的境界”是极高的赞许,不仅仅许地山的散文如此,他的一生亦是如此。在新旧文化交合的时代,科学、民主、自由、文明之风吹入人的心里,许地山在这一文化坐标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位戴着圆框眼镜、蓄着胡子的文人教授,以“落花生精神”与“蜘蛛哲学”作为毕生信念,渐行渐远,其身影却越来越清晰。

·书刊林·

《现代知识群体的话语转型(1949-1959)》有感

赵宗波

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文革”以后开始研究的学术热点之一。其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现当代的知识分子,还有古代知识分子。李刚所著《现代知识群体的话语转型(1949-1959)》(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以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知识、学术转型为考察对象,勾勒出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转型的大致线索,尝试性地解读了当代社会思想与时代历史变迁的丰富信息。

本书从第一章“延安经验与知识分子的心态”入手,选取这十年间的重要节点进行研究和论述,如第二章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第三章是“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检讨”,第五章是“对秦牧拒绝改造的批判”,第六章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第七章是“胡适思想批判”,第八章是“对陈鹤琴儿童教育理论的批判”,以及第九章“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所选取的典型人物和事例的改造或批判运动在当时乃至以后的文学界、教育界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杀伤力。它们将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的微妙关系,通过翔实的考证资料表现得淋漓尽致,捧读这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让人感慨万千。

作者指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改造最主要的理论资源。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不管是反动的还是不动反动的,要么是小资产阶级,要么是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之外的知识界,比如大学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在以后的数十年中,都成为了他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

1951年2月21日,电影《武训传》首先在中南海为中央领

导人放映,周恩来、朱德、胡乔木、饶漱石等领导人观看后充分认可了这部电影,随后,国内迅速掀起了褒扬武训精神的评论,据《人民日报》5月20日的社论统计,仅三个月内,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的报刊上登载的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近50余篇。2月21日当时,毛泽东没有去看,而是几天后调了去看的。这些褒扬的评论直至毛泽东“五二零社论中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以及3本关于武训的书及其48位作者”为止,以毛泽东为绝对权威的对武训的批评正式开始了。作者指出,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如此,80年代如此,90年代亦如此。80年代有了胡乔木的官方讲话后,学术界才敢对《武训传》、武训进行重新评价。90年代的研究中过分夸大了江青的作用。“其中一以贯之的就是学术研究对政治权威的依附,先有结论,后有论证,学术只不过是政治结论的解释而已。”

1951年,随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深入,由于陶行知早在二十年代起对“武训精神”的推崇导致了这一时期“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检讨”。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影响颇深,“他的学生们都是建国初期教育系统不可忽视的力量”,“他的教育思想又与毛泽东有着同构性”,批判了陶行知思想,连带使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在新中国的教育体系中都失去了地位。因此,对陶行知教育思想重新评价,更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

除了对《武训传》的批判,活人“享受”到党的大报整版点名批评的,在建国初期舆论还算相对宽松的时候是非常罕见的,对“秦牧拒绝改造的批判”便是这罕见中的典型。华南区党委的机关报《南方日报》的第三版竟用了整整一版的篇幅来批评他。